

台湾地区白领阶层的不公平地位 ——从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的视角

张 顺

摘 要：规模庞大、中上收入的白领阶层是现代社会维持稳定的基石。台湾通过工业化转型产生规模庞大的白领阶层，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末，社会阶层结构大致定型，但白领阶层的内在结构和社会地位仍在持续变迁。本文从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的角度对台湾白领阶层的变迁进行分析，发现近二十年来，台湾白领阶层在社会财富占有率、新增财富分配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白领阶层内部分化加剧，大量低收入白领向下流动，教育实现阶层跨越的机会越来越少。这不仅反映台湾白领阶层自身的萎缩和下滑，也体现台湾社会整体“下流化”趋势，加速台湾“M 型”社会结构的形成。

关键词：白领阶层；社会结构；阶层流动；“M 型”社会

作者简介：张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2025）04-0086-10

社会分层的差异性结构与社会分层间的流动是社会分层研究的两个基本问题，社会分层理论大师伦斯基（G.E.lenski）通俗地将其称为“谁得到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得到”。^[1]前者是指基于占有社会资源的多少，将社会群体划分为地位不同的层次结构，最基本的如马克思根据生产资料占有情况进行的阶级划分，以及马克斯·韦伯根据财富（经济地位）、权力（政治地位）、声望（社会地位）三条脉络进行的阶层划分。后者指人们通过什么渠道或机制而获得这种地位，被称为“地位获得”（status attainment），这些准入机制包括“血统或等级”“关系网”“推荐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文凭制度”“市场机制”“绩效考核”等等。^[2]从社会学的角度，要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就必须保证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的公平合理。社会结构公平指向结果公平，指社会资源分配并非集中于少数大资本家或权贵，而是尽可能让更多民众参与，最大程度减少阶层矛盾、保证社会稳定。社会流动公平指向过程公平，指社会流动机制合理且通畅，确保有能力的人通过公平竞争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在这当中，白领阶层的公平地位至关重要，庞大且开放的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middle class），特别是占主体的白领阶层，发挥社会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研究白领阶层可从社会经济学角度认知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和稳定性。台湾从上

[1]〔美〕格尔哈斯·伦斯基著，关信平、陈宗显、谢晋宇译：《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8 页。

[2]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年，第 9-12 页。

世纪 70 年代到世纪末，依靠工业化、后工业化的突飞猛进，快速创造出规模庞大的白领阶层。而近二十年来，台湾社会发展减缓甚至停滞，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白领阶层能否维持相对公平合理的阶层结构与流动性，包括维持一定的规模和地位，以及保持通畅的准入和向上通道，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也将进一步影响台湾社会整体发展。

一、台湾白领阶层的形成与变迁

社会分层是对社会结构的描述，最终由社会生产所决定。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分化，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成为新的工人阶级，一些工人上升为工人中的管理层，其中又有一些凭借管理经验和积累的资本，化身为小企业主，于是产生了劳工阶级、白领阶层、小资产阶级等等。包括马克思在内，社会学对社会分层的划分基本都是以工业化社会为对象和基础。台湾的白领阶层，也是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台湾工业化转型而出现和壮大的，并且带动 70、80 年代台湾社会分层研究的热潮。到了 90 年代末，台湾社会阶层结构大致定型，但各阶层内部以及阶层之间的分化仍在持续演进。

（一）台湾白领阶层的内涵与外延

社会学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有很多种，例如财富、生活水平、社会声望、学历、市场能力等等，其中，经济相关标准无疑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标准。而白领阶层的划分依据是“职业”，这是一个综合性标准，实际上包含了经济、声望、学历等要素。从职业角度，“白领”是指与“蓝领”相对的概念，在社会学理论中最早指“非体力劳动者”，后将低端服务业排除在外，指“从事非体力劳动，且收入和学历较高的受雇群体”。台湾学界一般将白领阶层定义为“贩卖知识或技术的受雇者”或“有效控制组织性与技术性生产资料者”，^[1]突出“知识”与“技术”的经济价值。白领阶层是受雇者，与“出卖劳动力、学历与收入较低”的劳工等“蓝领”阶层相比，一般具有“中等以上收入”与“高中以上学历”。白领阶层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与地主、中小企业主、“军公教”等“旧中产阶级”相比，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旧中产阶级”之后出现的“中产阶级”，因此又被称为“新中产阶级”或“新兴中产阶级”^[2]。在比例上，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白领阶层往往占据中产阶级的绝大多数。在不涉及“军公教”、中小企业主的情况下，不少学者将白领阶层与中产阶层混用。

外延上，一般认为白领阶层包括“企业管理者、专业工作者、销售人员、办公室工作人员”^[3]。同时，白领阶层的外延随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不断演变，无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新兴服务业，都向精细化、专业化发展，新的更高端的职业不断诞生，一些旧有的高收入职业或者被淘汰，或者沦为低收入职业，例如早期被视为技术人员的印刷工人，在科技发展后变成劳工。在台湾地区，根据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主计总处”的官方划分，白领阶层包括“民意代表、主管

[1] 叶启政：《台湾“中产阶级”的文化迷思》，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8 年，第 106 页。

[2] 萧新煌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8 年，序言部分第 11 页。

[3] [美] C. 莱特·米尔斯著，周晓虹译：《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61 页。

及经理人员、专业人员、技术员及助理专业人员、事务支援人员”。^[1]具体职业上,“民意代表”包括“立法委员”、“县市议员”等。“主管及经理人员”包括“董事长、董事、监事、总经理、经理、校长”等。“专业人员”包括“研究人员、医师、律师、艺文专业人员、宗教专业人员、药师、护士、会计师、工程师”等。“技术员及助理技术员”包括“助教、培训师、法律及行政半专业助理、社工、艺文及宗教半专业人员、生物医疗半专业人员、会计半专业人员、商业半专业人员、工程技术员、航空航海技术员、办公室监督”等。“事务支援人员”包括“办公室事务性工作、顾客服务事务性工作、旅运服务生、会计、出纳”等。

(二) 工业化与台湾白领阶层的发展壮大

上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是台湾白领阶层的萌发阶段。产业结构转型带动整体劳动力市场的变迁。1949 年以前,台湾主要是一个农业社会,约 60% 的人口从事农业。国民党逃台后实行土地改革、鼓励民营经济,自 60 年代开始由以农业为主的内向型经济向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转型,70 年代中期基本实现工业化。在这个时期,农业部门资金转移到工业,一些大地主开始开办企业,佃农转而成为工人。台湾中小企业迅速崛起,建立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工业体系,产生经营管理、财务会计、技术员、文职人员等新型中等以上收入群体,再加上过去为数不多的民意代表、律师、医师、科研等人士,形成最早的一批“白领阶层”。从当时的普查结果来看,在 1950 年,台湾的“专业技术人员、行政及主管人员、监督及佐理人员”等白领占就业人口比例约为 11.6%,1966 年约为 14.9%,1970 年约为 14.2%。^[2]

上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台湾白领阶层快速发展壮大。该阶段台湾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服务业比例持续上升,仓储、运输、金融、保险、不动产等高端服务业逐渐发展,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对专业人员及科研技术人员需求量大增。与此同时,台当局加大教育投入,自 1968 年开始推行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第一次大幅扩充,进一步开放赴外留学,并大量吸引留学生回台。在供需两方面引导下,接受高学历专业化教育、拥有更高技能和薪资水平的白领劳动者迅速增加。台湾学界一般认为,白领阶层的形成约在 1970 年以后,尤其是在 1975 年后大量增加。^[3]正是由于被称为“新中产”的白领阶层扩大,80 年代中期,台湾中产阶级达到总劳动人口的约 30-40%。根据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主计总处”1978-2012 年的“人力资源调查”分析,劳动力市场的中等收入人口 1978-1986 年增长了一倍,至 1990 年达到两倍,至 1995 年达到高点后维持低速增长。^[4]

(三) 台湾白领阶层的内部结构调整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社会阶层结构趋于稳定,白领阶层停止大规模增长,内部分化加剧。80 年代末期,台湾服务业产值超过总产值一半,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劳动市场对高端服务业与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台当局也开始推动第二次高等教育扩张,劳动

[1] 参见台湾《2023 年台湾“中央银行”年报》(2024 年 5 月),第 36 页,台湾“中央银行”网站,<https://www.cbc.gov.tw/tw/cp-726-169713-78cf7-1.html>。

[2] 王宏仁、蔡明璋:《台湾全志(卷九)》,台湾“国史馆”台湾文献馆,2006 年,第 85 页。

[3] 张晓春:《中产阶级与社会运动》,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8 年,第 180 页。

[4] 张宜君:《台湾产业转型下的工作机会分布变迁:1978-2012》,台湾《台湾社会学刊》2016 年 12 月第 60 期,第 162 页。

人口教育水平快速提升。受此影响,台湾劳动人口缓慢由劳工及农民阶级向白领阶层转移的同时,白领阶层内部结构加速调整。一方面,服务业高度分化,金融、保险、法律等专业化较高的高端服务业脱颖而出,与普通文职、仓储运输、银行出纳等服务人员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后者沦为“边际中产阶级”,从中产阶级向下沉沦。^[1]另一方面,企业主管类“经理人”减少,“高端服务业专业经理人、专家、技术工人”大幅增加。据统计,1992-2007年,“专家与技术工人”占劳动人口比例由8.87%增至17.12%，“专业经理人”占比由2.36%增至8.52%，“经理人”占比由13.31%降至9.46%。^[2]

1995年后,白领阶层人口总数及占就业人口比例缓慢增加。根据台湾“中央银行”历年年报,1995年台湾总就业人口为904.5万人,白领阶层人口为315.1万人,约占总就业人口34.8%。此后白领阶层人口以每年约3%的速度增长,到2004年达到405.2万人,占当时总就业人口41.4%。2023年,台湾就业人口约为1158万,白领阶层总人口约为537万人,占比约46.38%。^[3]各职业比例方面,根据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主计总处”2021年统计,“民意代表、主管及经理人员”约43.64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3.86%;“专业人员”约134.32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11.89%;“技术员及助理专业人员”约216.96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19.2%;“事务支援人员”约132.65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11.74%。^[4]

二、台湾白领阶层的“下流化”趋势持续增强

当社会结构出现不公时,社会财富过度向顶端聚拢,中产阶级萎缩,中等以下收入群体大幅增加。日本学者三浦展称之为社会“下流化”现象,日本80年代前经济高速增长,“新中间阶层”逐年增多、收入年年增加,拥有一种生活水平能够不断向上提升的期待,但90年代中期以后,这部分中间阶层日益减少,大部分由“中流”跌入“下流”。^[5]这是发达社会近几十年普遍出现的现象,整个社会不再处于上升期,提高学历、辛勤工作、积累年资再难理所当然地增加收入,逐渐形成“M型”社会。目前看,台湾白领阶层同样存在“下流化”趋势。

(一) 阶层地位及其测量

阶层地位是某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社会阶层本身就是按照一定标准对社会结构进行的分割,代表相应阶层的社会地位高低,但社会阶层及其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对台湾白领阶层社会地位的分析,就是按照一定标准,对其社会地位的测量和对比,以观测其社会地位的变迁,从而判断社会结构的公平性。如前所述,白领阶层的划分依据主要是职业,职业背后代表的是财富、社会声望、受教育水平等标准。这当中最重要的标准

[1] 王宏仁、蔡明璋:《台湾全志(卷九)》,台湾“国史馆”台湾文献馆,2006年,第178页。

[2] 林宗弘:《台湾的后工业化:阶级结构的转型与社会不平等,1992-2007》,谢雨生、付仰止主编:《台湾的社会变迁1985-2005:社会阶层与劳动市场》,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2012年,第23页。

[3] 参见台湾《2023年台湾“中央银行”年报》(2024年5月),第36页,台湾地区货币政策主管机关网站, <https://www.cbc.gov.tw/tw/cp-726-169713-78cf7-1.html>。

[4] 台湾《2021年家庭收支调查报告》,第117-118页,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主计总处”网站, www.dgbas.gov.tw/np.asp?ctNode=2828。

[5] [日]三浦展著,陆求实、戴铮译:《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3-4页。

是财富，包括资产、收入与生活水平。但资产和生活水平往往难以测量，且与原生家庭积累高度相关，因此，经济收入成为测量财富最具效度的指标，这也是社会阶层研究通常采用的做法。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主计总处”与台湾地区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历年来积累大量统计数据，其中“家庭收支调查”、“综合所得纳税统计”基本涵盖全台各阶层的人口规模和收入数据，可作为较具信度的测量依据，对白领阶层的收入水平变化做多维度的对比。

（二）经济收入实质倒退

经济收入是一定时期内财富的净增量，是维持一定生活水平的基础，直观体现社会阶层地位。白领阶层作为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一般具有中等以上收入，这是白领阶层的重要标志。从历年白领阶层经济收入的变化，可以横向观察白领阶层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变化。以 1994 年台湾白领阶层高速扩张末期为例，当年度全体就业者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为 43 万 9579 元（新台币，下同），白领阶层中“民意代表、主管及经理人员”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92 万 3504 元，“专业人员”为 70 万 5879 元，“技术员及助理专业人员”为 53 万 5672 元，“事务支援人员”为 40 万 540 元，多数白领阶层收入高于平均水平。^[1]此后近三十年，白领阶层各职业的人均收入缓慢增加，但去除物价因素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基本都在减少。如表 1 所示，自 1994 年至 2021 年白领阶层各职业的年收入增长率中，只有“民意代表、主管及经理人员”与“技术员及助理专业人员”明显高于平均增长水平。且 27 年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上涨约 41.1%，^[2]一旦加入物价因素，仅占总就业人口 3.86% 的“民意代表、主管及经理人员”年收入为正增长，绝大多数的白领阶层收入实质倒退。与其他阶层相比，白领阶层中的“事务支援人员”收入甚至逐渐落后于劳工、农渔民等“蓝领”阶层。经济收入是维持一定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的基础，白领阶层收入普遍实质倒退，表明白领阶层越来越难以维持中产阶级有品质、有体面的生活，在收入金字塔中的位置也明显下滑。

表 1 1994–2021 年台湾白领阶层年收入增长率与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长率对比

职业 金额（元，新台币）	1994 年	2021 年		增长率	年均增长率
	金额（元，新台币）	金额（元，新台币）	占劳动人口比例		
全体所得收入者人均	439,579	568,169	-	29.25%	0.955%
白领	民意代表、主管及经理人员	923,504	1,513,584	3.86%	64.90%
	专业人员	705,879	924,433	11.89%	30.96%
	技术员及助理专业人员	535,672	749,419	19.2%	39.90%
	事务支援人员	400,540	489,115	11.74%	22.11%
服务及销售工作人员	429,628	539,529	19.52%	25.58%	0.847%
农林渔牧业生产人员	248,220	479,510	3.78%	93.18%	2.469%
劳工阶级（技艺有关工作人员、机械设备操作及组装人员、基层技术工及劳力工）	385,703	518,549	29.91%	34.44%	1.102%
无行业	330,483	366,457	-	10.89%	0.384%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100（基准值）	141.097	-	41.097%	1.283%

资料来源：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主计总处”家庭收支调查与消费者物价指数统计。

[1] 台湾《1994 年家庭收支调查报告》，第 45 页，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主计总处”网站，www.dgbas.gov.tw/np.asp?ctNode=2828。

[2] 台湾地区“消费者物价指数涨跌及购买力换算”，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主计总处”网站，https://ws.dgbas.gov.tw/win>cpi_curv。

（三）新增财富占比较高，但与富人阶层人均差距扩大

社会各阶层的新增财富占比，从宏观上反映社会新增财富初次分配的水平。在“橄榄型”社会中，白领阶层作为中产阶级的主体，其新增财富占比一般应达到过半比例，使社会财富向平民流动，避免社会财富向金字塔顶尖过度集中。这体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从历年白领阶层新增财富占比的变化，可以纵向观察白领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变化。其新增财富占比越高，表明其与社会上层的财富差距越小，社会地位越贴近上层，社会整体结构也越合理和稳定。

各个国家和地区每年都会公布经济增长数据，但不会公布增长的财富是如何分配的。许多研究表明，越是处于财富金字塔顶尖的人，积累财富的速度越快，占有的新增财富越多，从而导致进一步的贫富分化。瑞士信贷智库瑞信研究院发布的《2023 年全球财富报告》表明，全球前 1.1% 的富人，占有全球 45.8% 的财富。^[1] 世界不平等实验室发布的《世界不平等报告 2022》称，全球前 10% 的富人，占有 76% 的财富和 52% 的收入。^[2] 这一趋势在台湾地区同样存在，过去近二十年，台湾前 10% 富人占有的台湾社会新增财富越来越多，中高收入的白领阶层，按收入十等分的第二至五等估算，占有的新增财富几乎没有变化。虽然白领阶层所得收入占比仍保持较高水平，但台湾社会的整体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白领阶层与社会上层的财富差距亦不断扩大。

表 2 2006—2021 年台湾贫富差距及白领阶层与前 10% 富人新增财富占比变化

年度	前 5% 富人与末 5% 底层平均综合所得之比	前 10% 富人当年度综合所得占比	白领阶层当年度综合所得占比（推估）
2006	58.2 倍	35.7%	44.4%
2011	94.8 倍	37.7%	43.7%
2016	104.2 倍	36.6%	44.5%
2021	537.9 倍	41.2%	44.6%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地区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历年综合所得税统计计算^[3]。

（四）财富再分配处于劣势

以税收为核心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是维持社会财富分配正义的主要手段。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普遍采取阶梯税制，对在社会财富初次分配中处于塔尖位置的富人课以重税，再通过公共支出补偿底层民众收入的不足。然而，随着税收制度日益成熟，富人逃避税收的手段层出不穷，“富人税”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起不到应有作用。台湾地区亦不例外，上层富人避税手段多样，税法经过多次调整，本身也偏向富人。在这种情况下，处于中间偏上位置的白领阶层实际纳税占比升高，在社会财富再分配中地位弱势。

白领阶层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主力，但并不掌握财富再分配制度的话语权。台湾的税收制度严重向富人倾斜，包括土地税、房屋税、遗产税、赠与税等等，对富豪征收的税率较低，减免

[1] 瑞信研究院：《2023 年全球财富报告》，第 127 页，<https://www.ubs.com/global/en/family-office-uhnw/reports/global-wealth-report-2023.html>。

[2] 世界不平等实验室：《世界不平等报告 2022》，第 4 页，https://wir2022.wid.world/www-site/uploads/2021/12/Summary_WorldInequalityReport2022_Chinese.pdf。

[3] 台湾地区历年“综税所得统计”，台湾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全球资讯网，<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285?cntld=64525>。

税额度逐年提高,许多规定存在避税漏洞。根据台湾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发布的公告,2023 年度台遗产税免税额达 1333 万元(新台币,下同),配偶、父母、直系血亲、丧葬费等可再免税近千万元;赠与税免税额每年 244 万元,夫妻双方每年共免除 488 万元。假设夫妻双方在去世前 10 年合理操作,仅通过免税扣除即可合法避税近亿元。遗产税和赠与税率 2009 年由最高 50% 调至 10% 单一税率,2017 年虽又调整为 10%、15%、20% 三级税制,但仍远低于国际普遍的 50%。由此在制度上造成上层富人维持财富积累优势,加剧社会不公。

三、台湾白领阶层的流动与更替

社会流动主要指社会阶层间的流进流出。一旦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发展遇到瓶颈,就会出现社会流动减缓、社会阶层固化现象,社会发展逐渐失去活力。这是社会学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是现代社会普遍面临的难题。台湾白领阶层的社会流动,主要研究的是台湾白领阶层的“地位获得”,及其与更上层及中下层相互流动的情况。

(一) 社会流动的意义及其测量

正常的新陈代谢是健康社会的基础,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就是民众通过教育、考试、市场、绩效等方式完成不同阶层的“地位获得”。在社会高速发展的时代,社会流动往往出现大规模的、迅速的流进流出,反映出整个社会的活力,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实现阶层跃升通常也比较容易。这主要出现在社会转型时期,如台湾地区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时期大量“黑手变头家”的现象。而在当前台湾社会结构总体较为固化的时代,对社会流动的测量要更为精准。这种测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白领阶层上下流动的难度和规模,二是白领阶层“地位获得”的方式。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较为全面地观察白领阶层上下流动的情况和方式,判断白领阶层是上升还是下降、扩大还是萎缩,观察白领阶层的“教育准入”是否有效,并能以白领阶层为窗口,观察整个台湾社会流动的流速和流向。

(二) 代际流动依然活跃

阶层代际流动率是研究社会流动的重要指标,指父子两代所处社会阶层的流动变化。代际流动又分为流入和流出,流入是指某代人父辈所处的阶层比例,也就是从哪个阶层流入;流出是指某代人子辈所处的阶层比例,也就是流向哪个阶层。台湾地区关于阶层代际流动的研究较早,台湾学者许嘉猷 1978 年就曾对台湾社会阶层流动做过研究,从当时看,“行政及主管人员”(公职新中产)有 31% 子承父业,而其下一代主要流向“监督及助理人员”(40.4%)与工人(23.7%);“专门性技术性及有关人员”以及“监督及助理人员”(市场新中产)主要由农民流入(28.5%、24.6%),下一代主要流向本业(23.1%、31.8%)及工人(26.9%、31.2%);“买卖工作人员”及“服务工作者”(老中产)主要由本业(35.7%、21%)及农民(28.6%、38.4%)流入,下一代主要流向本业(39.3%、19.2%)及工人(31.1%、47%)。^[1]而大陆学者刘欣依据 2017 年台湾社会变迁大调查(社会阶层组)原始资料测算,台湾公职新中产主要由老中产(31.4%)和工人(21.5%)流入,市场新中产主要由老中产(32.7%)和工人(31%)流入,老

[1] 许嘉猷:《台湾代间社会流动初探:流动表的分析》,伊庆春、朱瑞玲主编:《台湾社会现象的分析》,台湾“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78 年,第 527-528 页。

中产主要由本业（31.5%）和农民（35%）流入。^[1]

表3 台湾社会各阶层 1978 年与 2017 年流入率对比

		1978			2017		
阶层		本业流入	中产流入 (除本业)	下层流入 (除本业)	本业流入	中产流入 (除本业)	下层流入 (除本业)
社会上层		-	-	-	2.7%	39.3%	58%
公职新中产		31%	27.6%	41.3%	17.7%	42.5%	38.1%
市场 新中产	专业技术人员	9.8%	43.8%	46.4%	9.5%	40.3%	43.7%
	监督助力人员	17.5%	41.8%	40.7%			
老中产	买卖员	35.7%	20.1%	44.3%	31.5%	9.7%	52.8%
	服务员	21%	23.1%	55.8%			
工人		28.6%	19.3%	52.1%	32%	36%	30.1%
农民		87.7%	6%	6.3%	73.2%	13.8%	10.5%

资料来源：根据许嘉猷 1978 年的研究与刘欣 2017 年的研究计算。

进一步分析对比，可以观察到以下现象：一是台湾社会上层保持较高流动性，中产阶层在其中占比不小，但绝对数量不高；二是当前的白领阶层由下层流入的比例仍然较高，达到约 40%；三是占劳动人口近四成的劳工阶层，由中产阶层流入的比例大幅提升，占 36%，其比例的增幅可能与中产阶层基数的变化有关。这显示，白领阶层在代际间的跨阶层流动保持较高水平。

（三）结构性流动偏向萎缩

白领阶层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结构性上下流动，这种流动造就了两个特殊的阶层，即边际中产阶层与过渡中产阶层。边际中产阶层指职业归类虽然为白领阶层，但该阶层的工作缺乏技术性，而且重复性较高、收入偏低，随着社会发展可能逐渐跌出中产阶层。这一阶层代表了白领阶层的结构性下移，目前在台湾主要是“事务支援人员”，占台湾劳动人口约 12%。过渡中产阶层则特指与中产阶层同样从事非体力劳动，但收入水平尚达不到中产标准的阶层。这一阶层是紧邻中产阶层的下位阶层，具有上升到中产阶层的潜力，代表了白领阶层的结构性上移群体，目前主要是“服务及销售工作人员”，占台湾劳动人口约 20%。边际中产阶层和过渡中产阶层的上下交替是社会健康发展的标志，台湾上世纪 70、80 年代中产阶层高速扩张期就出现这样的现象。

但从表 1 来看，当前台湾白领阶层的结构性流动出现较大问题。一方面，作为边际中产阶层的“事务支援人员”快速下滑，收入水平严重低于平均水准，且差距越拉越大，虽然职业上仍被划分为白领阶层，但实际收入早就跌出白领阶层。另一方面，作为过渡中产阶层的“服务及销售工作人员”上升乏力，从 1994 年到 2021 年，其薪资收入的增长率比平均增长率还要低 3.7%，绝对收入更是与白领阶层相差甚远，过渡到白领阶层非常困难。“出易进难”情况的持续，预示着白领阶层的实质萎缩。

（四）学历教育准入趋于失调

在现代社会，教育、考试是白领阶层“地位获得”的主要机制，也是观察阶层流动是否

[1] 刘欣：《中国社会的中产化大转型——对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及日本阶层结构的比较分析》，《文化纵横》2022 年 10 月刊，第 20 页。

健康的重要指标。上世纪 80 年代,台湾大专院校经历了一波较长时间的扩招,院校数量也由 1981 年的 104 所增长到 1995 年的 134 所,2007 年达到 167 所。但此后,随着台湾社会少子化,大专院校达到饱和,2014 年 18-21 岁青年人口中,大专院校净在学率达到 70.85%,相较于 2000 年的 38.7% 扩张一倍。^[1] 这造成严重的后续影响,一方面,大专院校为了维持生存,不断降低录取标准,甚至出现“七分上大学”的怪象,家庭背景对于能否上大学的重要性降低;另一方面,优劣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和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家庭背景又成为影响就学优劣的主要因素。根据相关研究,家庭收入与就读台湾顶尖大学的几率高度正相关,其中 51% 的台湾大学学生来自家庭收入前 20% 的家庭,前五所顶尖大学的学生平均家庭收入约 150 万元新台币, top20 就降到约 120 万新台币,所有公立大学平均值再度降为约 110 万新台币,私立大学平均值则最低,约在 100 万新台币。^[2] 从教育背景看,白领阶层中具有“专业人员”背景的学生就读公立大学的几率最高,其次是“事务人员”和“自营业者”,其他中下阶层就读私立大学、公私立职业技术学校的机会更高。^[3] 总体来说,考上好大学才会有好工作,才能获得较高的经济地位,但好大学的入口依然很窄,越有钱、地位越高家庭出身的子女越有可能上好大学,变相造成阶层固化。从白领阶层内部来讲,这说明其阶层流动性主要来自于中层与中下阶层,中上阶层的流动在减缓,未来白领阶层能否保持目前的代际流动率并不乐观。

结 论

从当前社会结构来看,台湾白领阶层收入多数处于中等及以上水平,新增财富占比仍达 45% 左右,“下流化”现象尚未全面爆发。从社会流动的角度,白领阶层的代际流动率仍保持较高数值,社会阶层的固化、僵化短期内还不会出现。因此,短期内,台湾社会在缺少外力干预的情况下,整体仍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发生内部动荡的几率不大。

长期来看,台湾白领阶层实质薪资倒退,二次分配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内部分化严重,占白领阶层四分之一的“事务支援人员”向中下层跌落,教育准入功能失调,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均处于不利地位。而台湾白领阶层的不公平地位,反映了台湾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中等收入群体萎缩的前景,表明台湾“M 型”社会结构正在慢慢形成。

综合看,台湾社会发达的经济水平掩盖了白领阶层缓慢下滑的暗流,台湾白领阶层经济地位的不公平,并未引起显著的政治倾向变化。台湾社会长期淡化阶级叙事,白领阶层缺乏较为一致的政治态度或政治表达,其政治认同随着台湾社会整体“绿化”而越来越“独”,对台当局的不满缓慢积累、时有表现,但远未达到改变其统“独”认同的程度。

(责任编辑 姜静雅)

[1] 沈晖智、林明仁:《论家户所得与资产对子女教育之影响——以 1993-1995 出生世代及其父母税务资料为例》,台湾《经济论文丛刊》,台湾大学经济学系 2019 年 3 月版,第 406-408 页。

[2] 同上,第 417 页。

[3] 张宜君、林宗弘:《台湾的高等教育扩张与阶级复制:混合效应继续的不平等》,台湾《台湾教育社会学研究》2015 年 12 月刊,第 112-117 页。

The Unfair Status of Taiwan's White-collar Cla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Mobility
Zhang Shun

Abstract: The large-scale, middle- and upper-income white-collar class is the cornerstone of maintaining stability in modern society. Taiwan created a large-scale white-collar class through it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By the late 1990s, the social class structure was roughly finalized, but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social status of the white-collar class continued to chang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nges in Taiwan's white-collar cla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mobility.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aiwan's white-collar class has been at a disadvantage in terms of social wealth share and new wealth distribution. The intern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white-collar class has intensified. A large number of low-income white-collar workers are moving downwards, and there are fewer opportunities for them to achieve class crossing through education. This not only reflects the shrinkage and decline of Taiwan's white-collar class itself, but also reflects the overall "downward" trend of Taiwanese society,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Taiwan's "M-shaped" social structure.

Key Words: White-collar Class; Social Structure; Class Mobility; “M-shaped” Society